

袁旭 李兴仁 雷德昌 吴美华 编著

第二次中日战争

纪事

(一九三一·九——一九四五·九)

档案出版社

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

(1931.9—1945.9)

袁 旭 李兴仁 编著
雷德昌 吴美华

档案出版社

1988年

DK70/21

30

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

袁旭 李兴仁 编著
雷德昌 吴美华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75 字数356千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11283·040 定价：3.50元

ISBN 7-80019-053-6/K·15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1931年 | (21) |
| 1932年 | (34) |
| 1933年 | (46) |
| 1934年 | (62) |
| 1935年 | (71) |
| 1936年 | (83) |
| 1937年 | (98) |
| 1938年 | (136) |
| 1939年 | (179) |
| 1940年 | (226) |
| 1941年 | (261) |
| 1942年 | (300) |
| 1943年 | (335) |
| 1944年 | (370) |
| 1945年 | (402) |

绪 论

(一)

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刚过去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又挑起了一场新的中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迄1945年9月日本投降止,整整延续了14年。其间分为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两个时期。这场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虽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和吸取这次战争的历史教训,将有助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本来,这次战争的起因、性质及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主要因素等等,是很清楚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国内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日本的某些人,甚至还企图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至于导致日本军国主义败亡的主要原因,更是众说纷纭。苏联人说,日本所以投降,主要是由于他们出兵东北,消灭日本战略预备队关东军;美国人则说,主要是他们在太平洋的胜利和原子弹的威力,促使日本投降。在国内,大陆与台湾,对抗战功过的评价问题存在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孰是孰非,最好让历史作结论。“事实胜于雄辩”。确凿的史实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曲直,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本《纪事》,力求“全方位”地记录当时有关的史实,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第二次中日战争,特别是全面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土地上,同时存在三种军队(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个政权(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抗日民主政权)、三种地区(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相互制约,构成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立体画面。为了保持历史

的立体感，我们对“两国三方”的重大活动，都作了客观的纪录。同时鉴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法西斯“轴心国”的若干重大事件，也作了如实的反映。

(二)

第二次中日战争，同第一次中日战争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产物。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解决其发展资本主义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矛盾，把向外特别是向中国大陆扩张，定为基本国策。1868年明治天皇执政伊始，就发表御笔信，公然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为此，以“强兵富国”为号召，实行军国主义。逐步实施其吞并朝鲜，灭亡中国，征服世界的既定国策。于是在1874年侵占我国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94年出兵朝鲜，直至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

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得寸进尺，鲸吞蚕食，从未间断。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更为变本加厉。1927年4月20日，长州军阀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为积极推进其“基本国策”，加速入侵“满蒙”的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在东京召集“东方会议”，协商对华政策。会议经11天谋划，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会后，田中将其确定的侵略方针，密奏裕仁天皇。谓：“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②此即举世所闻的“田中

^① 《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34页。

^② 《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339页。

奏折”。随后，日本政府又于同年8月间，在旅顺召开所谓“大连会议”，具体研究贯彻“东方会议”确定的侵华方针。此后，日本关东军就加紧进行攻掠“满蒙”的准备。

1929年秋，资本主义各国陆续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也于1930年卷入这次致命的经济危机中，饥饿、贫困笼罩着全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充满着不满和反抗。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缓解其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加速推行其“基本国策”。于是，吞并“满蒙”政策，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可悲的是，当日本军国主义密锣紧鼓，行将入侵东北之际，国民党当局却继续集中兵力于南方“剿共”，置北疆安危于不顾，给日军入侵提供了良机。当然，国民党内不乏爱国之士，可他们难于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虽然他的民族意识并未完全泯灭，但在他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天平上，其重心总是在阶级意识（阶级私利）一边。当他维护领土主权的主观愿望，与其阶级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宁可牺牲前者而维护后者。此外，当时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这对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一再制造事端，不断挑衅。我东北军民忍无可忍，曾奋起还击。对此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而且一再密令制止。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电示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翌日又以于右任名义电张：“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①8月16日，蒋介石再密电张氏（即“铣电”），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安危于不顾”。^②“不抵抗主义”盖源于此。蒋介石如此三令五申，仍不放心，复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周（9月12日）亲

① 吴湘潮：《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 1973年版 第85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0年版 第六辑第24页。

赴石家庄，秘密召见张学良，面谕：“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①

其实，当时东北我军力量并不小，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日军。日本在东北各地的正规部队约有4万人，加上“在乡军人”2万人，合共6万余人。而东三省我国正规部队有16.5万人，地方武装约4万人，合计超过20万兵力，三倍于敌。加上有几千万东北同胞作后盾，又在故土作战，具有地利人和之优势。虽然武器装备和官兵素质不如敌人，但如果决心抵抗，至少可以与敌相抗衡。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却不准抵抗，这无异于助纣为虐。

(三)

日本关东军经过几番试探，摸清底细后，就放开手脚干。比预定计划提前10天，于1931年9月18日晚，向沈阳大营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围攻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揭开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序幕。

在事变当天，张学良再次奉蒋介石和南京当局命令，转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沈阳守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谓：“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缴械任其缴械，入营任其入营”。^②“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③这样，日军更加肆无忌惮，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3天时间，就占领了辽宁省除辽西一隅之外的所有重要城镇。前后4个多月，东三省国土全部沦入敌手。

国民党当局屈服退让，但富于抗敌御侮精神的中国人民则要

^① 《文献和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6年第3期第56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抵抗运动》第3页。

^③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第11页。

抗争。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宣言》，复于9月22日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民众领袖陶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等^①，在感到依靠当局抗日，收复失地无望后，即挺身而出，在东北同胞支持下，于9月27日在北平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作为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责任。

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救国会具体组织领导下，纷纷拿起刀枪棍棒，组织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与此同时，东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如赵镇藩、黄显声、冯占海、李杜、马占山、苏炳文等^②激于民族义愤，也先后拒绝“不抵抗主义”命令，奋起抗争。如马占山等指挥所部进行的黑龙江江桥防御战，李杜、冯占海指挥所部进行的哈尔滨保卫战等，都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大刀会，以及一些尚有爱国心的“绿林好汉”也毅然加入抗日义勇军行列。

中共满洲省委，为发展东北人民抗日形势，派遣周保中、李延禄等得力干部，参与领导抗日义勇军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抗日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前，东三省各地抗日武装，大约有200余支，约15万人。同年夏天又猛增到30余万人。

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掀起了广泛的抗日

① 陶宝航当时是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卢广绩是辽宁省工会联合会会长；高崇民是辽宁省农会会长。

② 赵镇藩，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黄显声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冯占海，吉林边防军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李杜，吉林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马占山，步兵第三旅旅长，黑龙江省代主席，黑龙江陷落后曾一度降日，旋即反正，坚持抗日；苏炳文，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旅长兼中东铁路哈满线护军司令。

民主运动，声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并要求南京政府改变外交方针，“对日宣战”。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理事会曾两次通过决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

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国际舆论对其侵占满洲的注视，并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为了取得攻掠中国内地的一个进攻出发阵地，于1932年初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1月28日晚，日军分几路突然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驻上海和宁沪沿线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给十九路军以大力支援，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在一个多月的激战中，毙伤日军1万多人，使日军三易主帅，且寸步难进。然而南京当局继续坚持其退让方针，不给十九路军以必要的支援。除第五军外，不再增派援军。而日军则大量增兵上海，到2月底已多达10万之众。时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加上后来参战的张治中第五军一部，总共约4万余人。致使守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3月2日弃守第一线阵地。3月3日经英、美、法、意等国斡旋，中日双方决定于是日停止军事行动。随后经双方代表谈判，于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驻上海，而日军则可以在上海驻扎，并可扩大其占领区域。这显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自杀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33年1月初，东北日军又向西进逼，攻掠了山海关，并向热河及长城沿线发动新的进攻。华北告急。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机，于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呼吁全国武装力量联合抗日。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掀起了新的抗日浪潮。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爱国官兵，也纷纷要求最高当局改弦易辙，并请缨抗日。南京当局为形势所迫，终于采取了某些应急措施，派遣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瑤率所部

三个师北上，增援华北部队。于是有长城抗战之举。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七七”事变前，我国军队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日战役。我参战和担任侧翼钳制的部队，共12个军40个师约近40万人。其中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及其他杂牌部队和义勇军。日军共投入3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战役从1933年3月上旬起迄5月底签订《塘沽协定》止，历时两个多月。因为敌我装备优劣悬殊，更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专心“剿共”而无决心抗日，致使长城抗战后援不继，被迫以订立“城下之盟”而告终。中国军队不得不撤离长城区域，使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失地丧权之辱。

在长城抗战面临失败，日军向察哈尔进犯的时候，原西北军统帅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具体帮助下，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后来加入共产党）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高举抗战旗帜，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弃笔从戎，投奔同盟军。华北的一些爱国的地方武装也集合在同盟军的旗帜之下。同盟军在很短时间内，就由组建时的几千人发展到10万之众。6月间，同盟军分兵出击，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察北重地。7月，经9天血战又一举收复多伦，并乘胜追击，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然而南京当局却唯恐激怒日军，而妨害其“安内”政策。于是采取“拆台”政策，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压迫同盟军。冯玉祥承受不住压力，于8月间愤而辞职。方振武、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孤军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10月间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同盟军终归失败。

长城战事平息后，日本侵略者，稍为改变了一下策略。即由“鲸吞”改为“蚕食”，由军事攻掠为主，改为政治压服为主。企图不动刀枪而攫取华北。日军经过一番策划后，于1935年对华北采取了新的侵略步骤。先于六七月间，迫使华北当局订立旨在满足

日军对察哈尔的实际统治权的《秦土协定》(《察哈尔协定》),以及限制国民党及其嫡系部队在冀察活动的《何梅协定》。继于10月间在河北香河县,唆使汉奸暴动。复于11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支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一系列旨在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事件,史称“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我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捐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迅速掀起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党组织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伟大的爱国运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并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推动新的革命高潮继续向前发展,于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清算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发展了《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制订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为广泛地动员和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和各种势力一致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由于民族矛盾明显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不仅中间阶级追随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而且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分化。许多有识之士主张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南京最高当局也感到完全按老路子走下去已不行了。所以一面继续坚持“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一面开始做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例如开始关注物质建设,特别是在与战备密切相关的工业、交通方面,在刘鸿生、吴鼎昌、钱昌照等社会知名人士积极参与筹划

和指导下，到1936年取得了初步成就，为后来的全国抗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由于有了初步的准备，更由于全国已形成的抗日救亡潮流不可逆，蒋介石遂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侵略“逆来顺受”的对策，准备采取相对强硬的方针。于是，他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36年7月五届二中全会上，曾一再宣告：“如果牺牲到了最后关头”，他就要“听命党国”起而抗战。这说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已有了新的变化。

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国共两党从1935年冬起，开始重新接触，双方试探对方意向。随后两党派出正式代表，开始对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铺平了道路。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直在进行着。东北抗日义勇军，由于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于1932年冬、1933年春遭到失败。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先后率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等率余部退入热河。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特别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仍在发展。1932~1933年间，中共满洲党组织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起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军。1934年，东北抗日武装，先后粉碎了日“满”军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扫荡”。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35年冬，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着手进行筹建抗日联军的工作。1936年2月20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宣布将东北各地抗日部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此后陆续编成11个军，共约3万余人。其中第一至第七军是中共直接领导建立起来的，第八至第十一军，是中共协助友军编成的。抗日联军和义勇军，给东北的日伪（满）军以有力的牵制和打击，消耗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

事变前后，日军在东北死伤17.2万人。^①这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为祖国立下的第一个功劳。

在人民抗日怒潮推动下，国民党部队的一些爱国官兵，也不甘坐视国土沦丧。他们继承和发扬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与侵略者抗争。傅作义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傅作义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驻守西北边陲。1936年6~8月间，日伪（蒙）军数度进犯绥东的红格尔图等地。8月初，傅作义亲临前线，指挥所部反击进犯之敌，一举将敌击溃，收复红格尔图。同年11月15日，日伪军在日机配合下，兵分三路再度进犯绥东。傅作义提出“守土有责，不容坐视”的口号，组织和指挥所部英勇抗击。经几昼夜激战，毙伤敌人千人以上，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在绥东碰壁后，旋将进攻矛头转向绥北，企图从西北面突破绥远防线。傅作义获悉敌之企图，即先机制敌。于11月下旬，在敌重兵到达之前，向敌后方补给基地百灵庙，主动出击。经一夜恶战，守敌除少数突围逃窜外，其余悉数就歼。傅军收复绥西北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绥远抗战捷报传出，举国欢腾。毛泽东、朱德即致电祝贺，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专程赴绥远慰劳前方将士，赠予“为国御侮”锦旗，以资嘉勉。绥远抗战胜利，振奋了人心，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四）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周密策划和充分准备后，决定把灭亡整个中国的最终目标，提到行动日程上来。于是，驻北平市郊日军，于1937年7月7日，突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将中日战争推进到第二个时期——全面战争时期。我国面临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整个中华民族，不论那个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都投入了抗日斗争，形成了全民族一体抗战的悲壮局面。

^① 〈日〉《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翻译版 第701页。另据日满官方史料记载，这个时期，日伪军被击毙者5000余人，伤病者17.3万人。

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抗战胜利的道路，鼓舞了全国人民必胜的斗志，促成和维系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及其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解放区战场）。这两个战场是相对独立的，但在战略上，是互相支援和互相依存的。两者构成中国抗日战场的整体。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①

自卢沟桥事变迄武汉陷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在“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把战略重心放在正面战场，集中主力攻城掠地，并企图给国民党军队以致命打击，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妥协。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军几乎倾全部兵力于中国南北两线，同时发起战略进攻。

我国根据敌强我弱，以及敌国小人少，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双方特点，确定采取与敌相反的战略方针，实行持久战。蒋介石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指导方针，一般地说是可取的。在“持久战”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上，国共两党是一致的。但在战略和作战方针上却存在着原则分歧。中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限于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在作战指导方针上，中共主张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即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之目的。而国民党则实行消极防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967年版第518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同上，第453页。）

方针，即死守阵地，被动挨打，起初同敌人死打硬拚，最后拚不过就“兵败如山倒”。一个片面抗战路线，一个消极防御方针，是造成正面战场失利的两个根本原因。

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是比较努力的，他们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的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因此，全国的抗日局面，显得颇有生气。特别是在前线奋力作战的爱国官兵，同人民军队一样，为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忠贞效命，慷慨捐躯。以身殉国者，不仅有许多下层官兵，而且也有著名的将领。他们将同人民革命先烈一样，都应该受到崇敬和纪念。惜乎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政略、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加之一些军阀部队积重难返，致使广大爱国志士壮志难酬。

在正面战场，由于南京当局指导上的过错，造成许多本可避免的失败，导致半壁河山沦丧。但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力配合下，终究争得了15个月的宝贵时间，掩护全国由平时状态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基本上达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特别是遏止了日军由华北直下中原的“闪电战”。保障了国民政府重心西移，得以进行持久战。同时消耗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自“七七”事变至1938年底，整个抗日战争（包括敌后战场）共歼日军70余万人。日本侵略军由于消耗过大，其战线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越发突出。因此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就被迫终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战争遂转入敌我相持阶段。此后日军把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敌后战场。

在战争转入敌我相持阶段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1937年9月，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友军协同下，于平型关首战告捷。这是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打的一个歼灭战，使全国军民为之振奋。随后八路军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进入晋东北地区，以恒山、五台山为依托，开辟晋察边区敌后战场；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

罗荣桓率领下，进入晋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下，进入晋西北地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开辟晋绥敌后战场。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张浩（后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进入晋东南地区，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晋冀豫边区敌后战场。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下，各部队很快打开了山地敌后战场的局面。随后挥戈东进，向平原和沿海地区扩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38年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就在华北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等五大敌后战场。

继八路军之后，新四军在叶挺、项英、陈毅等率领下，于1938年春挺进华中抗日前线，随即展开于大江南北的敌后地区。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创造了华中敌后战场。后来又在八路军南下部队协同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先后形成了苏南、苏中、苏北、皖中（皖江）、淮南、淮北、鄂豫和浙东等敌后战场。

在华南地区，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领导东江、珠江地区人民起义，组建抗日游击队，在曾生等领导下，逐渐开辟了广东（东江、珠江）敌后战场。在海南岛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琼崖抗日游击队，在冯白驹等领导下，独立坚持孤岛抗战，开辟了琼崖敌后战场。

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觉察到敌后战场的潜在力量和对其后方的严重威胁，遂由重视国民党转而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战场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企图扑灭抗日游击战争，以巩固其占领区。当时日本陆相板垣声称，其军事战略改攻为守，集中兵力于适中地点，以图消灭抗日游击队，而求占领区治安之维持。据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938年冬确定其对华作战指导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区，促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在华北方面“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重要交通线”。同时，“按需要可在占据